

二、佳话：徐荣村的世博缘

中国人参与世博会的历史,一开始就有许多猜测。很多人都以为,第一个有幸和“炫奇会”(世博会)发生关系的中国人是清末著名的文人王韬。因为他在法国以游客的身份参观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并写下了自己目睹的一切,认为世博会“物玩精奇,宸游怡畅,称盛集焉”^①。也有人认为中国人参与

世博会是在1873年,因为那一年,时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派了一个名叫包腊的英国人代表中国参会。还有人认为是1876年,因为这一年中国海关代表李圭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费



1867年巴黎世博会

城世博会,并写下了《环游地球新录》一书。这几种说法都与世博会有关,但都显得证据不足,难以令人信服。严格说来,王韬是以游客而不是以世博会的参展单位代表的身份进入世博会,而且他始终是站在观察者的角度而不是参展者的立场审视世博会的。他的记述几乎不带感情色彩,只是一种实情实景的描述,缺乏思想的深度和认识的广度。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赫德委派的包腊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政府委派的代表,只是受赫德的指令参加世博会的,中国政府并没有积极的态度,也没有很主动的表现,因此还不能说这是中国人参加世博会之始。1876年李圭作

^① 《漫游随录》卷二《博物大观》,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为中国代表参加了费城世博会,又有专门介绍世博会的书籍问世,因此大多数学者将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锁定为李圭,认为这才是中国参加世博会之始。诚然,李圭作为官方选派的代表参加费城世博会,代表中国同西方国家进行工商交流,开创了有中国人亲自参加世博会的先例^①,但是,仔细翻阅历届世博会的历史记录,就会惊奇地发现,在李圭之前还有更早的中国人在首届世博会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1851年第一届伦敦世博会

目前披露的历史资料表明,中国人与世博会结缘,应是在更早的1851年。在这一年的首届伦敦世博会上,香山买办徐荣村的“荣记湖丝”的闪亮登场和精彩表现,一下子拉近了中国与世博会的距离,也增添了人们

对世博会的兴趣。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为了展示英国工业技术的划时代成就,决定1851年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他们通过外交途径准备邀请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参展,期间还要进行展品评比和工艺活动。英国在华官员和商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试图动员中国参展。1850年12月14日,英国侨民在上海编辑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曾有广州成立的委员会突然停止工作的报道。主要原因是英国的筹备会认为,应该由中国政府和商人出面组织参加,不应该由外国机构和代理来代表中国人参加世界博览会。1850年12月21日《北华捷报》又刊登消息说,报纸呼吁上海商界为博览会选送展品已经很久了,但只有英、法、美三国领事和少数商

^① 俞力主编:《历史的回眸——中国参加世博会的故事(1851~2008)》,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人响应,大多数的中国商人对此反映冷漠。在为数不太多的商人当中,香山买办徐荣村的积极主动的表现,却开了中国人走进世博会的先河。

徐荣村(1822~1873),香山北岭村人。《北岭徐氏宗谱》中的《徐君德琼行状》和《荣村公得奖感言》,就为我们了解徐荣村其人其事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和宝贵的资料。《徐君德琼行状》是这样介绍这位神秘的人物的:

君讳瑞衡,字德琼,号荣村,广东香山县人。曾祖煌,恩赏八品銜。祖会兴,父士雄,皆以君犹子润二品銜候选道加二级,赠荣禄大夫如其官。君少而好学,读书通大意,顾迫于家事,兄钰亭君命君早治生。君遂出就贾,历游东南诸海口。适中外通商,沪上商务为中外冠,闽粤次之。君往来居积,壹意经营,不数年间累业巨万,一时与君同为贾者莫能及君万一,窃窃然谓君有何神术乃速富如此!

咸丰纪元,英国开百年大会于其伦敦之京城,百国咸集。锦绮珠玉,如山如海,奇技淫巧之物,为人耳目所未经者不可以数计,而君独寄七里湖丝十二包往陈于会。既而较论久之,竟推君丝为会中第一,中外人无异词。英国主亲临观之,喜甚,奖君金银牌各一,手谕画幅一帧,俾君执以为券。幅中作洋人有两翼欲飞状,盖以寓君货当飞行天下之意。至是,君名益大噪。自后君所置丝必标翼飞洋人于其上,所至辄售去,即他物人亦知君无欺罔不争售者。君业愈以饶,然后知君之为贾非果有他术以致富也。其取财必精,其致工必密,而一切苟且惰窳之见不参焉。故君之货则上品,售之则上价耳。致富之速岂偶然哉!

君既富,甫逾壮岁,苟称是以往再数十年,君之富且不可量。而君乃废然返,曰:“吾先人窳窳之未安,吾其何以为人子孙矣。天下无尽之财,留以为吾后人无穷之业可也。”于是归至家,延名师,相善地,自高、曾以下数世墓域,皆君手定,前后费十余万金。又以余力创家庙,置祭田,追远报本之诚,惟恐不至。其事亲也,愉愉膝下,不为声色,惟以仰体亲意为善。母容太夫人,年将百龄,君左右扶掖之,使太夫人自忘其老富。偶有不择,则率诸孙男女,演杂剧,比武力于前,必得太夫人一笑而后止。君富后所

私积,诸昆弟群从或有用之,辄无所吝。尤不自多,其能于外人则轻财仗义,苟有以患苦贫乏相闻者,必满其意以去,虽多金不少吝。说者谓天知君之能用其财,故亟亟然以财畀君也。君诚不负斯言矣!

君援例以郎中注吏部铨赏戴花翎。生于道光二年壬午,卒于同治十二年癸酉,年五十二岁。娶张氏,封宜人。妾四,黄氏、陈氏、梁氏、某氏。子八人,女六人,孙六人。将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塘西瓜埔之原四会。

在另一篇《荣村公得奖感言》的文章里,族人对其在沪经商的过程和参加世博会的情形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我荣村公之商于沪也,与钰亭公俱。钰亭公既以丝茶兴其业,公默揣商务亦无他物更驾于丝茶之上者。惟丝茶销路之畅岁以数千万计,群商麇集,惟利是图,所售之货,良窳杂糅,不无欺诒。洋商竞买之时不暇区别,他日积货渐充,或有霉腐,一经检点,必且以华商为不直不信而诟病之。于是详加谘访,审择再三,一丝一茶,必居上品。顾茶之形色易辨而丝之层累实繁,稍涉包荒,纰缪百出。公乃潜心体会,剖析毫芒,精益求精,慎复加慎。积日既久,丝之纯驳,一望而知,虽苕霅养蚕之家,苏宁世业之匠,匪特不能蒙公,且又闻所未闻,叹为不可及者。适英国伦敦京城设为大会,五大洲之地挟其宝而往者相望于道。公独寄湖丝十二包,载诸四万里而西达于斯会。会中之丝高与山奇,多如蚁聚,视公之丝蔑如也。既而互相比较,反复谛观,万口同声,咸以公丝为第一。英国君主闻之,喜甚!奖公金银牌各一,又赠画一帧。画作洋人两腋有翼欲飞状,盖祝公货飞行中外也。公遂作翼飞洋人小幅,置各货中以售。自是公货所至,是丝非丝无不争先速购者。今画帧尚藏于家,因摹绘之,并公旧日货牌诸式揭诸谱中,以见公之服贾十年,致富巨万,厚福之来,非偶然也!

这两篇文章对徐荣村的生平事迹做了简要的介绍,但并未透露他参加世博会产品展览的真实动机,也没有对他参展的相关背景和参展前后的过程做进一步的交代,徐荣村本人也未曾就参展世博会的全过程做一

完整的记述和详细的说明。我们从这些文字材料的表述中仍然不难想象当年徐荣村在万商云集的上海艰苦创业和奋发图强的情状,也不难从其身世和阅历中看出他在商海泛舟时的精明与干练、超脱与创新。

也许,徐荣村所寄的十二包“荣记湖丝”,在首届世博会上获金银大奖早已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一向就对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格外重视。香山买办特有的世界眼光和竞争意识,以及契约精神,在徐荣村这里同样有着强烈的表现。他在五口通商后久居上海,深知信誉乃经商之本,对自己经营的丝茶等物,“详加谘访,审择再三,一丝一茶,必居上品。……积日既久,丝之纯驳,一望而知,虽苕霅养蚕之家,苏宁世业之匠,匪特不能蒙公,且又闻所未闻,叹为不可及者”^①。正像《北岭徐氏宗谱》上所记载的那样,徐荣村在良莠杂糅的上海商场上,始终坚持“其取材必精,其致工必密,而一切苟且惰窳之见不参焉。故君之货则上品,售之则上价”的经商理念,遵守中外商贸的规则,诚信经商,友好往来,互惠互利,共谋发展,因此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像绝大多数香山买办那样,徐荣村也在长期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刻地意识到中外贸易之间有着巨大的获利空间,与洋人打交道或做生意可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收入。与传统的中国商人不同的是,他还知道洋商需要什么,什么样的中国产品最受洋人欢迎。19世纪香山买办始终坚守着茶叶和生丝这两个传统产品的购销领域,相信,“无他物更驾于丝茶之上者”。他们经商的侧重点是丝和茶,采购的地区主要是福建、浙江、江苏和长江流域一带。尤其是南浔“辑(七)里湖丝”,不仅品质上乘,而且运输方便,为外商所喜爱。长期经营茶叶和生丝贸易的香山买办,对蚕丝质量优劣有准确的判断力,很少有走眼冒失的时候。尤其是徐荣村,不仅勤劳刻苦,办事练达,而且长于学习,善于总结,在商战中练就了一双判断蚕丝质量的“火眼金睛”。徐荣村深知蚕丝质量优劣高低,关键在于它的源头。经过长期的比较和观察,最终确认南浔湖州的丝,质量最高,品

^① 《1851年英国伦敦世博会上评委会关于中国参展品的评语》,转引自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第110页。

质最优。因此他选择了湖州丝,并将其命名为“荣记湖丝”。就这样,徐荣村经营的“荣记湖丝”,以其材质上乘、信誉可靠而倍受洋商欢迎。他本人也在长期的中外商贸过程中与洋商和当地的蚕农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的“荣记湖丝”的质量和销售,因此也就持续地得到有效的保证。

难能可贵的是,身为买办商人的徐荣村,并不像大多数中国商人那样只看重自己手中的钱财和眼前的生意,缺乏公平竞争的理念和向外拓展、做大做强的气魄,而是善于把握商机,追求更大的品牌效应和利润生成。立足中国而又放眼世界,坚持诚信经营,遵守市场规则,注重自己的声誉和社会形象,甚至能够恰到好处地实现自我超越。1851年,英国宣布举办首届世博会,敏感而又聪慧的徐荣村获悉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产品营销、品牌塑造和市场拓展的机会。经过仔细打听和认真研究后,他相信长期经营的湖州丝在世博会上一定会受到关注和重视。于是,徐荣村决定选择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参展。了解了世博会参展的一些规则和要求后,徐荣村很快命人精选了12包的“荣记湖丝”,紧急船运至英国伦敦。没想到的是“荣记湖丝”和其他中国工农业产品、工艺品一起在首届世博会上亮相后,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尤其是包装不够精致的“荣记湖丝”最初惨遭冷遇。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金子总会有闪光发亮的时候”那样,“荣记湖丝”参展数月后,其优点逐渐显露出来,评委经过反复比较后,一致认为:“在中国展区,上海荣记的丝绸样品充分显示了来自桑蚕原产国的丝绸的优质品质,因此评委会授予其奖章。”^①就这样,“荣记湖丝”一举夺得金、银大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发奖牌和奖状。“荣记湖丝”等中国工艺品的获奖,为国运式微的近代中国和落后的工商业带来了一线希望。

与众多的商人不同的是,买办商人徐荣村获此殊荣后,并没有大肆宣扬自己的功德和荣耀,而是以香山买办商人所特有的机敏灵活和务实创新的品格,积极主动地抓住世博会产品获奖的机遇,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商

^① 《1851年英国伦敦世博会上评委会关于中国参展品的评语》,转引自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第110页。

业经营领域,提高产品的综合竞争力。他请来画匠将奖状上的“翼飞美人”图案描摹下来,作为荣记产品的商标,推出系列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以诚信经营和服务创新来扩大产品品牌的竞争力。这在当时中国的工商界的确是一种新的尝试,也为以后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起了示范带头作用。世博会不仅使徐荣村声名远播,也使中国商人和企业家开始重视产品的品牌打造和品牌效应的充分利用。借世博会来提高自己经营的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产生名牌效应,实现利润最大化,虽然不是旧式中国商人所能想象和充分考虑得到的,但他们从徐荣村的经历里隐约地看到了参与世博会的希望。毫无疑问的是,在人们对首届世博会的功能作用和社会影响还缺乏认识的情况下,徐荣村的这种积极参与的态度和创造性地抓住商机的做法,显然为后来中国参与世博会和中国人认识世博会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有用的借鉴。

徐荣村以“荣记湖丝”走向首届世博会,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也使包括香山人在内的中国人与世博会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既与徐荣村个人的禀赋和强烈的竞争意识有关,同时又与他所代表的迅速在通商口岸崛起的香山买办群体的特殊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香山徐氏家族的买办生涯肇始于徐钰亭,他早年在邻近的澳门经商,曾与英商宝顺洋行的合股人 T. C. 必理交往甚密,通商后他随必理来到上海,成为宝顺洋行的上海买办。19世纪50年代,他的弟弟徐荣村也在他的安排下成为宝顺洋行的上海买办。他们又引荐侄子徐润和徐芸轩入宝顺洋行工作。徐润在洋行站稳脚跟后,又以同样的方式陆续引荐族人入洋行充当买办,如堂侄徐渭南在他的引荐下成为宝顺洋行的九江买办,堂兄弟徐关大也在他的引荐下任怡和洋行的上海买办,表弟杨梅南也是在他的帮助下出任太古洋行的烟台买办。徐润的三子徐叔平因父亲的关系,当上了德商洋行的买办。1859年徐润还将同乡世交郑观应介绍到宝顺洋行工作。香山唐廷枢为代表的唐氏家族,莫仕扬为代表的莫氏家族,郑观应为代表的郑氏家族,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彼此引荐和作保进入洋行做买办的,并逐渐成为近

代中国颇有影响的买办家族。^①他们不仅在19世纪中西文化交汇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而且也成为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和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推动者。^②

徐荣村就是在家族兄弟的影响下进入上海这个新辟的通商口岸城市的。香山人的团结互助和务实进取的精神,在他身上也同样地有着出色的表现。他机警灵活,勤俭好学,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为人诚恳守信,与中外商人关系融洽。同时,对外部环境的诡异多变和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能主动地将自己的事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有着难得的自信、自立和自强的独立自主精神。正因为香山买办强烈的人世精神和浓厚的爱国爱乡之情,才使他们在面对外来势力的挑战时,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抗争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多数人对世博会产生隔膜的时候,徐荣村却主动地选送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参加首届世博会的重要动因。参加首届世博会也许是机缘巧合的结果,但诚如学者所言:“在当时众多的洋行买办中,独有徐荣村一人能敏锐地把握机遇,让自己的商业经营融入世界,这充分显示了徐荣村作为一名崛起于新兴城市中的商人的先进理念和超前意识。”^③参加首届世博会,香山买办徐荣村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人。

三、理想:郑观应的世博情

如果说香山买办徐荣村与首届世博会结缘还只是停留在“参与”的层次上,那么,同样是洋行买办的香山人郑观应对世博会的态度则完全进入了自主自觉的状态。他从“商战”的角度,更加强烈地要求中国在世博

① 参见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54页。